

平凡父亲的教育智慧

## 王明明：学规律而不学样式

■叶芳芳

“几十年前，北京城有位姓王的读书人家，生了一群男女孩子，没有任何靠山地从容简朴过着日子。本人爱好点书法图画，也注意孩子们人格的培养，孩子们都濡染了正正当当的文化教养。我这话听起来普普通通。在北京城的生活中找户这种人家还真不易。我说的这个王家，主人名叫王念堂。我跟王家不熟，也没有过往来，只记得几十年前这王家的孩子中的一个得了世界儿童画比赛的优美奖品。那时候，中国美术家协会刚正式进驻帅府园新盖的大厦不久，发奖的那天是由美术家协会展览部负责人郁风大姐主持，那个得奖的儿童名叫王明明，穿着一套齐整的衣冠接受了来自国外的精美纪念品。（我当时好像是美协的常务理事分得了一些这类有趣的照片），王念堂先生一辈子专注两件事：培养、维护孩子群的高尚文化兴趣。保持全家十几口老老小小免受冻饿，并且一心一意地在艰难环境中让明明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画家。这像个大树上的大鸟窝。十几只老老小小蹲挤在窝里嗷嗷待哺，王先生夫妇来回喂食居然还要考虑孩子们的艺术性和前途。听起来好像是讲笑话，实际上几十年的含辛茹苦，居然做到了。”

这是黄永玉先生在《爸爸们的沧桑》中写下的一段话。他敬佩于一个普通人对于子女的付出和教育，亦感怀于父爱的坚毅与深沉。

王念堂出生于山东蓬莱，早年喜好书画，17岁到丹东，后转到沈阳。当过学徒，做过职员，还与爱好文学的朋友们办过杂志，与书画界的朋友们研究书画，但因生活



王明明 李之仪《卜算子·相思》词意图

71x30cm 2015年

所迫，只能去搞实业。1948年王念堂到北京后就开了家造纸厂，但还是惦记着心中的梦想，于是，便把自己的夙愿寄托在儿女身上——七个子女中，四个从了艺，王明明行五。

王明明眼中的父亲，耿直且执着。“他对喜欢的东西特别执着。退休后他才把毛笔拿起来，恢复了几年后，他写的草书、楷书、行书已很见功力，后来还在新加坡做了展览。在他百岁的时候，我给他做了一场书法展览。”

可以说，王明明会走上艺术之路，与父亲的循循善诱和着意指引分不开。王明明笑着说：“我”相当于是他的作品。

## 遍访名家 高人指点

在父亲的教育信念里，搞艺术创作一定要找“大家”，要对路，要有高人指点。所以童年时期的王明明，在父亲的带领下，就已遍访名家。

王明明5岁开始拿笔，6岁就见到了李苦禅先生、陈半丁先生。“我把临的字拿给李苦禅先生看，他先把纸翻到背后看看是否力透纸背，再告诉我用笔的方法。”王明明说道。后来李苦禅先生的女儿李燕回忆说：“你才是我爸爸最小的徒弟。你来的时候还没有画案高，是我爸爸把你抱到案上看他作画的。”

9岁见到了吴作人先生，吴先生夫妇俩对他特别喜欢，善意提醒他父亲：儿童画家小的时候出名，可能在14、15岁时有一个转折点，这个转折点转好了他会很顺利地走下去，如果转不好，他可能一辈子不喜欢了。“后来到我转折的时候，的确是这样。因为儿童画家画得越熟练，进入成人的素描、速写教育的转型期越是困难。”王明明感慨道。

15岁左右，他又结识了启功先生，“那时启功先生的老伴刚去世，家里没有人，我父亲也很用心，让我母亲热了奶、包了饺子，自己骑着脚踏车过去，从宣武门到西城启功先生的家，我和我弟弟有时候一起去听他讲字的结构，经常一聊就是半天的时间。”父母的言传身教、耳濡目染，对王明明影响极大。

而后他向周思聪先生、卢沉先生、姚有多先生学习中国画基本功及创作，并求教于蒋兆和先生、刘凌沧先生、陆俨少先生、宋文治先生、何海霞先生、许麟庐先生、黄永玉先生、方增先先生等诸多大家。

父亲带他见了诸多大家，却没有让他去追随某一个人，而是让他从这些老先生们身上学习一些观察事物的方法、学习的方法。他说，任何人都长处，你只要能够学到这些长处，每天的收获都会很大。

多年来，王明明就是本着“学规律而不学样式”的原则，博采众长，建立自己的判断力与独立思考的能力，去辨别什么是对、什么是错，吸收什么、钻研什么、舍弃什么。

“我到了画院后，创作时遇到很多问题，就是我的画法和周思聪先生太一样，如何能够有自己的面貌。1980年的时



王念堂(中)、王明明(右)、王加(左)三代人

候，我想从题材上有所区分，她画现实，那我画古代，于是开始画了杜甫。”王明明说，“老师非常宽容，她不限于你是不是学她，她能够看出学生的长处，我从他们身上学到了心胸、包容，以及发现别人的长处补充自己，并提携年轻人，传承就应该是这样。”

此外，父亲还尽己所能带他去观看能看的东西。“他带我去厂店看会引导我：你看看厂店里最吸引你的是什么？他的理念是你有感觉你就画，不要有什么顾虑。”父亲的包容，给予他创作上足够的自由度，他也以自己的兴趣点展开，画了马戏团、人民公社等诸多主题性创作。

## 严谨家风 不骄不躁

在做人和为艺上，父亲和王明明强调了品格的重要性。王明明说，“我印象特别深，那时候被叫‘神童画家’，经常参加展览，他说你一定不要在成绩的时候骄傲，而且不要在你展览的画面前洋洋自得，一定要找出自己的问题和毛病。”同时，其父非常注重对传统文化的教育。他说要画好画，一定要写好字。“文革时画不了画，他就让我们写楷书、隶书。我先后临了颜真卿的《多宝塔》，汉代的《礼器碑》《曹全碑》以及《圣教序》等，并经常请教书法家徐之谦先生，他教我认识各种字体的间架结构与书写规律。”

父亲的严格要求，令他之后在遇事时得以游刃有余，亦让他在绘画技法和个人修养方面都有较大的提高，并很快走上正规的创作道路。

“1977年我考上中央工艺美术学院，当时业余画了很多装饰画，有意进入装潢专业，但却被分配到特艺系（壁画专业）。因为不喜欢，我就决定不去了。最后在周思聪先生的引荐下，我加入了北京画院，成为一名专业画家。过了两年，美院开设研究生班，卢沉、姚有多先生都说‘你来吧，没有问题，你就考吧’，我说我也不考了，画院很好。在决定不要这份文凭、不考研究生班这些转折点上，我也得到父亲的大力支持。在这些问题上，就看你要什么，孩子们的方向是需要家长的主见去把

握的。”

父亲的作用一方面在于激发孩子的最大潜能，另一方面，在孩子的人生重要转折点上帮助他把握方向、作出准确选择。

王明明的恩师周思聪先生对他有一句精准的评价：“一个聪明的老实人，聪明却不狡猾，老实却不愚笨”。对人生的领悟与判断，王明明是有大智慧的；而对专业知识、管理能力的学习，他又是扎扎实实的。

比如他在北京画院担任院长时连续多年做的20世纪美术大家系列，就切实落到了“老实”二字，他为老先生们做展览、出画册，很多人不理解，画院里也有不同反对的声音，但他认为“作为研究，必须回顾历史，谁能在历史上留下作品、留下经典，就给谁做。”事实上，这一系列的确为20世纪美术大家的学术研究填补了空白。

从小他从父母、前辈身上学到的，就是踏踏实实地创作，老老实实地做人、做事。沉下心来，排除各种各样的干扰——名利的干扰、社会杂事的干扰，使自己静下心来。为此，他多次请辞卸去各类社会职务，60岁以后把社会活动几乎减为零，除了最好朋友和服气的艺术前辈的展览开幕式，剩下无关的、露脸的、刷存在感的活动一概不参与。他说，人生很短，精力有限，要留出更多的时间给创作。

父亲眼中的王明明是听话顺教的，而儿子王加眼中的王明明是充满爱心与童趣的，爱看动画片，也热爱小动物。三代人的艺术教育，可谓一脉相承。在王明明的艺术熏陶下，王加从小痴迷于各门类音乐，并爱好摄影，在英国威斯敏斯特大学主修音乐商业管理，回国后曾在中国国家博物馆从事策展工作，亦出版过《音画之间》《画外有音》等书籍，叶朗先生看中他，亦邀他到北京大学上公共选修课。

从父亲的角度，王明明对王加的教育，重品行甚于重成绩、重能力甚于重学历，尽管儿子偏科，他亦让他知道如何发挥自己所长，取长补短。这不仅是一个父亲的教育智慧，更是祖孙三代殊途同归的艺术追求。（王明明，系国家一级美术师、北京画院艺术委员会主任。）